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人文与社会译丛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James C. Scott

[美国] 詹姆斯·C. 斯科特 著 程立显 刘建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刘东 主编 彭刚 副主编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美国] 詹姆斯·C. 斯科特 著 程立显 刘建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 (美) 斯科特
(Scott, J. C.) 著;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7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ISBN 7-80657-177-9

I. 农… II. ①斯… ②程… III. 农民-生活-现状-研究-东南
南亚 IV. D4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663 号

Copyright © 1976 by Yale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98号

书 名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作 者 [美国]詹姆斯·C. 斯科特

译 者 程立显 刘建等

译 校 成 力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77-9/I·154

定 价 15.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刘东 1999年6月于京郊溪翁庄

MA66/H8
07²

前 言

vii

这项关于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这一事实对于认识剥削问题有着巨大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有可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本书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检验了这一理论。农业的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逐渐破坏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书对此类反抗的两个突出事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一静苏维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自校对本书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不少关于第三世界农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关于反叛运动的档案材料。这些都会加强我的论点,也会加入一些细微的差别。特别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未能读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这两书。

读者将会注意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图指明——特别是在论述“错觉”问题时——此种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线, viii 但我自己在这里也不过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异议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本书于1973年到1974年间完成初稿。那时,我幸运地得到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迁居巴黎从事19世纪艺术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时间,广泛地阅读了被泛泛地称为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的著作,特别是马克·布洛克和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罗伯特·曼德鲁和R.C.科布论大众心态(*mentalités populaires*)的著作。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著作的某种精神,尽管我不愿意自称是他们团体的成员而玷污他们的学派。我不定期参加了由尼科斯·普兰茨和阿兰·图雷纳组织的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高级研讨会,深受启发,随之极大地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程度。乔治·孔多米纳也欢迎我每周参加他的令人兴奋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研讨会。同在我之前的许多学者一样,我得益于麦迪逊人文科学图书馆的设备和学术氛围,非常感激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萨科夫、埃兹雷·叙雷曼和亚纳·巴尔贝等学者结下的学术友谊,给孤苦写作中的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巴黎的海外档案馆和伦敦的印度公务图书馆,为我

在本书中关于越南和缅甸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资料,我要感谢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

倘若不是 1973 年春从亚洲学会的东南亚发展顾问组得到半年的研究奖金,使我有机会整理酝酿已久的思想,我就不会进入写作状态。

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上的帮助,真是难以尽述。而且,据我所知,我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合作者愿意继续做无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谢詹姆斯·罗马塞特、小巴林顿·穆尔和西德尔·西尔弗曼,他们的著作帮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加伊·帕拉迪塞·凯利、萨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亚历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评帮助,那么,本书无疑要在事实和分析两方面出现更多的错误。关于顺从和错觉这个无论如何都有出错危险的话题,我拒绝了罗纳德·赫林、托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尔和迈克尔·莱瑟森的许多批评。他们对我的论点的抨击,帮助我进一步巩固了论点,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全然抛弃自己的观点会感到遗憾。我用来巩固观点的部分材料来自杰出的荷兰 ix 学者 W. F. 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学术观点。

在本书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评者中间,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阿代斯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提出了最尖锐深刻的意见。根据他们仔细阅读之后的意见,我重新思考和系统阐述了许多论据。虽然我肯定不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论最后成书的质量如何,本书能达到目前这个程度都是同他们的详细评论分不开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土地使用权研究中心,作为主要负责我在农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机构,十分友好地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资助,使有可能根据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重写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曼和 F. 海沃德,给了我多方面的鼓励,确实难以尽述。尤为重要的是,爱德华·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开设了有关农民的政治活动和革命的课程——在学术的非神秘化、关于马克思以及农民问题等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使我难以报答。我只能希望本书不辜负他的友谊和指导。

詹妮·米特纳切特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还修复了由于我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会而造成的许多文字硬伤。

说到这里,按照标准前言的惯例,该是作者为书中的错误和自己的固执包揽全部责任、免除他人责任的时候了。但我不一定想这么做。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J. C. S.

1976 年 5 月 26 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生存伦理的经济学与社会学	(16)
“安全第一”: 生存经济学	(19)
生存伦理的社会学	(33)
农民社会中的风险分配	(36)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41)
第二章 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	(44)
风险与社会分层	(44)
乡村的风险保障	(51)
租佃与分成租佃的风险	(56)
风险和政府	(66)
第三章 风险分配与殖民地变革	(72)
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	(75)
乡村保护的弱化	(78)
辅助生存资源的丧失	(79)
农村阶级关系的恶化	(84)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与世界经济	(108)
第四章 作为勒索者的政府	(118)
缅甸	(128)

越 南·····	(137)
第五章 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	(148)
交趾支那：“红色恐怖”·····	(155)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162)
起义过程·····	(182)
下缅甸——沙耶山起义·····	(191)
第六章 剥削的分析意义：互惠与生存的公正 ·····	(202)
剥削的标准·····	(203)
剥削——一个道德难题·····	(213)
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215)
生存——基本的社会权利·····	(226)
传统与稳定交换的打破·····	(230)
社会分层、义务和权利·····	(231)
第七章 反叛、幸存和镇压 ·····	(248)
反叛的结构性背景·····	(251)
反叛与农民的社会结构·····	(259)
不反叛，自助，或溃散·····	(261)
不反叛：镇压和“错觉”问题·····	(287)
索 引 ·····	(308)
译后感言 ·····	(321)

导 论

1

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①

这是托尼对 1931 年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但他没有把这一生动描述推延至 20 世纪初位于印度支那的上缅甸^②、东京^③和安南,或者东爪哇、中爪哇地区的农民状况。这些地方也是如此,小片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艺、变幻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贡金、贡品,每个村头都可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

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农民特有的生态小环境使他们面临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上缅甸的干旱地带,始终受制于老天爷的不可预测的降雨量。英国人征服下缅甸不久,上缅甸的这一地区

① R.H. 托尼:《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波士顿,1966),第 77 页。

② 上缅甸,缅甸本部地区北半部的俗称。1852 年第二次缅英战争时,英军侵占缅甸本部地区勃固、卑谬和伊洛瓦底三角洲南部大片领土。同年 12 月,英国派阿兰为首的划界小组,自美太英军驻地的旗杆以北 10 公里处的德贡茂村为起点,向东至东吁城北;向西至第悦茂至若开北端单方面自行划界立桩。该线以北缅甸王政府管辖区称作“上缅甸”,以南英国占领区称作“下缅甸”,沿用至今。——责任编辑注

③ 东京,即北圻,越南旧行政区之一,包括从今中越边界至清化省(不含该省)地区。法国侵占越南后,改称东京保护地。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改称北部,亦称北越。——责任编辑注

遭受了 1856—1857 年的特大饥荒。“雨水奇缺,田地里水稻枯萎,……人们死去。他们死状凄惨,有的在田地里啃着树皮时死去;有的在马路上四处寻找食物时死去;有的死在家中。”^④ 在泰国东北的安南和其他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并且至今记忆犹新——不止一次的大荒年:体弱者、年幼者死掉了,剩下的人不得不吃耕畜、吃稻种,不得不靠通常用来喂耕畜的麸糠草料活命。

然而,1944—1945 年越南北方农民所遭受的大饥荒,其严重程度使得 20 世纪这一地区的其他生存危机倒显得小多了。在最好的年景里,东京的可耕地也只能勉强养活当地人口。但是,日本人及其维希同盟,把许多稻田改种黄麻和其他军用农作物。1943 年 10 月收获季节之后,占领军真正地武装清洗了乡村,没收了大量谷物。1944 年 5 月到 9 月的一连串台风,摧毁了堤坝,淹没了东京的许多稻田,毁灭了 10 月份的收成。于是,一场准饥荒变成了完全的大饥荒。连小米、马铃薯和米糠都吃光了,剩下的只有马铃薯叶、芭蕉根、青草和树皮。设法种了点马铃薯的人也许会发现,它们已经在夜间被人扒出来吃掉了。1944 年 10 月和 1945 年春收之前,发生了大饥荒,多达 200 万的越南人饿死了。^⑤

大多数东南亚人的生存危机和饥荒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小:

^④ 引自《缅甸政府关于 1896—1897 年缅甸大饥荒的报告》,见 M. 阿代斯:《下缅甸的农村发展与多元社会》(麦迪逊,1974),第 45 页。

^⑤ 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冬季的描述,参见 N. V. 兰翻译的 T. V. 梅的文章:《谁之罪?》,收入吴永隆:《革命之前:法国人统治下的越南农民》(剑桥,1973)。许多农民经历了这一时期的“越明”组织,它协助组织了对官府粮仓或日本人运米船的攻击,从三角洲周围弄来粮食。对这一时期越南人的政治活动的简要论述,参见黄金庆:《越南的八月革命新解》,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 30 卷第 4 期(1971 年 8 月),第 761—781 页。

局部的旱涝,导致大批耕畜死亡的瘟疫,收获季节毁坏粮食的风灾雨灾,或者是毁坏庄稼的鸟、鼠和毛虱。食物匮乏也许仅限于这样的家庭:其土地不是太高太干就是太低太湿,其主要劳力在插秧或收获季节病倒了,其子女太多而土地太少。即便收成充裕,外部人的索取——地租和税收——也会使粮食不足。

如果说 30 年代的大萧条给整个一代美国人的恐惧感、价值观和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么,我们能够想像出周期性的食物危机对季风气候下的亚洲稻农的恐惧感、价值观和习惯所产生的影响吗?

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对食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这种说法可能比较恰当。这种东南亚农民同 19 世纪法国、俄国、意大利共有的道德,是生活在边缘地带的结果。糟糕的收成不仅意味着食物短缺;而且,为了吃饭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或者是变卖土地耕畜而减少来年收获足够食物的机会。农民家庭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要买一些盐、布等必需品,还要满足外部人的不可减少的索取。一个家庭能生产多少大米,部分地取决于运气;但种子的品种、种植技术和耕作时间的地方传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试验和挫折才形成的,使得在特定环境下能有最稳定、最可靠的产量。这些都是由农民发展起来的技术安排,用以消除“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还有许多社会安 3 排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互惠模式、强制性捐助、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都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否则,这种资源欠缺就会使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这些技术和社会安排已确认的价值,大概恰恰使得农民在来自首府城市的、帮助他们的农学家和社会工作者面前,表现出布莱希特式的固执。

下文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生存伦理置于分析农民的政治

活动的中心。论述本身始自于我对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席卷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持久研究。对其中的两次起义，即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中部的被称为“义(安)——(河)静苏维埃”的起义，我要作详细分析。

从东南亚殖民地史的角度看，这些反叛活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的附带现象，尽管对于在反叛战斗中死去的人们来说，这些活动决不是小事一桩。两次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了，两者都未能实现农民的任何目标，两者都被认为是政治戏剧的次要情节——这场政治戏剧越来越受民族主义者和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所主导。从另一层更深远的历史意义上看，这些活动是边缘性的。在不可抗拒的中央集权化和商品化世界上，他们寻求封闭的、自治的农民乌托邦。它们或多或少属于自发起义，打着农民地方主义的一切招牌。在农民地方主义的世界里，世俗民族主义的大部队是殖民地国家的惟一有效的反对力量。同其他向后看的农民运动或工匠运动一起，两次起义是——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难免的牺牲品”。^⑥

然而，从另一种观点看来，我们可以从将近半个世纪前被打败的反叛者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我们理解激起他们不顾一切冒险的义愤的话，就能掌握我称之为他们的道义经济的东西：他们的经济公正观念及其对剥削的实用性定义——在他们看来，对他们的产品的哪些索要是难以忍受的，哪些索要是可以忍受的。由于他们的道义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农民中也有代表性——我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农民政治活动的道德规范根源有更为充分的理解。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懂得殖民地时

^⑥ E.J. 霍布斯鲍姆：《历史中的阶级意识》，见 I. 梅扎洛斯编：《历史和阶级觉悟散论》（伦敦，1971），第 11—12 页。

代的中央经济和政治的转变系统地违背了农民的社会平等观,我们就会认识到作为“低等阶级”^⑦的阶级何以比无产阶级更为经常地举起反叛和革命的旗帜。

这里要做个必要的说明。我的研究主要的不是分析农民革命的原因,这项任务已经由 B. 穆尔和 E. R. 沃尔夫很好地完成了。^⑧ 通过研究农民的道义经济,我们可以知道使他们愤怒的是什么,而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什么东西会引起爆炸性局势。但是,如果说对剥削的愤怒足以激起反叛的话,那么,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就都会燃起反叛之火。认识到自己受剥削的农民是否确实造反,这取决于众多相关因素——诸如同其他阶级的联盟,统治者的镇压能力和农民自身的社会组织,对此,我们这里一带而过,不加讨论。我要论述的是,在农民社会里当受害者认识到剥削的时候,剥削的性质如何;什么东西会形成社会的爆炸性形势,而不讨论社会爆炸本身。(我把自己限制在这一讨论范围内,不仅是出于对穆尔和沃尔夫研究革命的杰出成果的尊重,以及对学术分工的认识;而且因为在我看来,比起革命战争来,没有反叛的剥削是十分正常的事态。)在本书最后一章,我要说明在没有反叛的情况下,对于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悲剧性选择是什么。

我赖以立论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但却是有力的,它产生于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的经济困境。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收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

^⑦ T. 尚宁:《作为政治因素的农民》,载于《社会学评论》,第 14 卷第 1 期(1966),第 5 页。

^⑧ 分别见《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6)和《20 世纪的农民战争》(纽约,1969)。

- 典型情况是,农民耕种者力图避免的是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并不想通过冒险而获得大成功、发横财。用决策语言来说,他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如果说把农民看做面向未来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的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力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
- 5 政治行为。首先考虑可靠的生存需要,把它当做农民耕种者的基本目标,然后考察他同邻居、精英阶层和国家的关系,看他们是援助还是阻碍他满足这一需要——这就要重新阐述许多问题。

这条“安全第一”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秩序的许多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中。举两个例子,使用不止一类的种子以及在分散的条块地上的欧洲式传统耕作,就是为了避免过度风险的古典技术,而常常以减少平均回报为代价。一个村庄里的一大批社会安排,主要是为了确保住户的最低限度收入。定期地根据需要重新分配的公有土地,或是欧洲村庄的公地,其功能全在于此。此外,前资本主义村庄内的社会压力,也有某种再分配的功用:富裕农民要仁慈待人,主办较多的开销和较大的庆典,救助暂时穷困的亲戚邻居,慷慨地捐助当地的圣祠庙宇。正如 M. 利普顿所指出的:“许多看似古怪奇特的村庄活动,实际上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⑨

上述社会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社会的特色。但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安排浪漫化、理想化,这是个严重错误。它们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相反,它们仅仅意味着一切人都有权利依靠本村资源而活着,而这种活着的取得,常常要以丧失身份和自

^⑨ M. 利普顿:《乐观地对待农民的理论》,载于《发展研究杂志》,第 4 期(1969),第 341 页;转引自沃尔夫:《20 世纪的农民战争》,第 279 页。